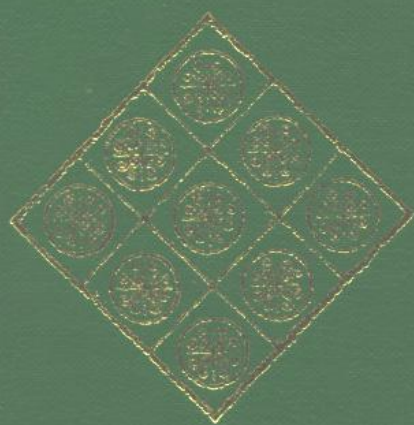


中国地理学史

先秦至明代

王成组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地理学史

(先秦至明代)

王成组 著

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

ZHONGGUÓ DÌLIXUÉSHǐ

中国地理学史

(先秦至明代)

王成组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385-7/K·46

1988年2月增订第2版

开本787×1092¹/₁₆

1988年2月第2次印刷

字数294千

印数2,300册

印张13¹/₂，插页5

定价: 5.40元

增订本说明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年代之久远,门类之繁多,著作之丰富,足以与由不同民族前后相承所发展的西方地理学各树一帜,遥相对称。在我国的灿烂文化业绩中,亦足以与文学、史学、哲学相映成辉。在古老的中国地理著作之中,有一些早已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少数地理作品,不但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涉及东方其它广大地区,成为稀有的参考资料。

但是,我国的文、史、哲三门,早有关于本门学术的历史性研究,而地理学史迟迟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半个世纪前,由顾颉刚先生发动的《禹贡》、《山经》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历史地理上的作用,所提出的结论也存在着一些片面性的问题。当时认为《禹贡》出于战国后期的理由,如同铁器通用的时期,近年的考古发现已经使时间大大提早。那个时期也带动了王庸编写出第一本《中国地理学史》;主要还是采用史书上的地理类书目,以及古代的传统观念加以整理。1962年,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出版,对于历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与特征,才首次提供系统性的介绍。

我从1977年起编写《中国地理学史》,采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著作表现出我国地理学上的新观点、新观察方法和新整理方法的创立与因袭的过程,以及少数正确观念与错误观念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为此,对于少数来历可疑的著作,尤其要全面衡量它们写作的年代;如果有可能,也要探索它们的作者,从而使得产生时期不同的地理见解与方法,能以形成一套合理的发展程序。为着便于了解同一类型著作发展的过程,从西汉到明末,按四大类型分篇叙述。

年代的问题,在先秦著作中尤其重要,而并不以先秦为限。考证年代的迟早,不能限于作品内容的年代条件。对于内容的认识,不宜局限于作为年代的标志,而更需要鉴别其中的虚实真假。地理作品尤其便于从对照客观自然条件中的山川与部位,以及有关事物与观念,辨明真假虚实。考证的范围,必须从《禹贡》、《山经》的究竟何者更早,特别包括西汉末年刘歆的伪造《周礼》。而酈道元的《水经注》,究竟是否有一种单独早编的《水经》供他作注(不同于郭璞作注的《水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本书所提供的有关作品年代与内容虚实的许多见解,对于阐明不同作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见解大多没有预先作为论文发表,因此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的情况,地理学界有时一方面仍然把《周礼》中所提到的地图的种种使用途径,以及《职方氏》一节的内容,都承认为西周早年的制度;另一方面依照顾颉刚的主张,却把《禹贡》推迟到战国后期。这样就把刘歆模仿《禹贡》所伪造的《职方氏》一节,其来历先后竟然颠倒。这次希望能引起地理学界与史学界的共同注意。

拙著初版于1983年春,供应以来,承蒙广大读者的关心,许多城市半年余就脱销。去年秋季,商务印书馆拟予重印,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改印增订本。此次集中增加的章节,有关于《史

记·货殖列传》、巩珍《西洋番国志》、汪大渊《岛夷志略》，以及王士性《五岳游草》中的片段。另外还有分散的长短不等增补修改。由于笔者正在培养研究生等种种牵制，这一项工作原定在去年赶成，竟然延迟半年之久，深为歉疚。

采用本书的编制以阐明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存在着一个缺陷，即是不能充分表明我国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势力盛衰的变化与影响。这一点体现出中国地理学史与中国历史地理具有必要的分工。在此同时，笔者希望研究地理学史与历史地理的同道，对于本书所提供的意见，能从多方面分析是非，批评指正，而对于可取之点，希望能共同采用。

本书初版时，定名为《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原来准备紧接着就编写按三期划分清代发展情况的下册。由于教学任务较重，又年逾八旬，分册难以紧接。这次的增订本作为自成完册，而标明《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清代部分，尽量在力能兼顾的限度内继续完成，以免功亏一篑，从而编成第一套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史》。

本书的出版问世，商务编辑部陈江同志近年多方协助，得益非浅，特此致谢。

王 成 组

1985.7.15

序 言

我国的地理学既是起源特早,而绵延不断,具有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光荣史,并且保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遗产。这样一脉相承,留下丰硕的成果,世界上无与伦比。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却是经过现代许多国家不同民族的祖先,先后相承,此起彼落,才能获得近代地理学的成就。西方的地理学超过中国,只是由于最近二、三百年的进步。一般见解竟然因此而认为中国向来落后,甚至空虚,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误解。实际上在这个最后阶段,我们也还有独特的成就。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的西方化,高等院校发展地理系,在五、六十年前开始,解放后更大量增加。现代式的地理研究相应成长,解放后正在逐步赶上国际水平。但是地理学史性质的少数专题,早先只有史学界的部分同志在关心,地理界反而极少顾问,以至已有的这一门著作,寥寥可数。为此在垂暮之年,还想夺回些失去的年月,填补若干空白。

六年前我动过直肠癌手术,被认为将会丧失工作能力,以至三年多之前奉命退休。医学上的大进步保证了我顺利恢复健康,保持着发病前的视力、记忆力和分析能力。为着使得历代流传的地理文献能以为现代科学发生正确的作用,我坚决退而不休,把早先粗略准备过的地理学史编写工作立即动手。由于反复修改,本册定稿屡次延期。为着编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史》,阐明清代部分的另一册,还需要继续努力。

地理学史的编写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本书是以探讨历代的各种地理作品所反映的地理观点与地理方法为主轴。对于写作年代可疑的少数作品,都依据这一要求来分析辨别不同作品的前后关系。例如《尚书》中流传的《禹贡》,经过战国到西汉,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怎能轻易改定为战国后期的作品?我们应当考虑是否具有产生在战国之前的条件。《周礼》一书,通常认为西周初年周公所作,清代后期早有姚际恒、康有为等各家先后考证出它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这部书的《职方氏》一节,以及有关重视地图的条文等等,实际都反映汉代的规模——许多有关地理与地图的条目,迥然不能配合周初的条件。

《水经注》一书,传统观念向来把酈道元的辛勤贡献认为限于作注,而假定其中所谓《水经》部分是东汉末或三国时人所早已编成。实际上如果没有酈氏的注所查明的各条水道流经地点,怎能编出所谓经文说明的路线,在三百年前的东汉末?这种无法证实的推测,是由于不懂得地理方法的作用。为此,我们提出经、注全是酈氏一手编成的主张。传统观点还把《佛国记》说成法显只做口述,也是无稽之谈。法显自己有写作的文才,记中用名字可以是自谦的方式。

关于我国地理学史的阐述,本书准备一个全面的概括,以表明有史以来东方地理学发展的过程和特征,不包括西方地理学在本世纪初传入以来的新发展。历代重要地理文献中凡是有争论的问题,还希望所有关心的同志展开讨论,尤其是对于某些作品的时代意义和科学作用,以取得一种公认的结论。我们应当使得国内以及国际的地理学界,充分认识中国地理学的光

荣传统。

本书前四篇的初稿，一年前打印分送各方征求意见，曾经得到许多同志热情赐教，除遵照修改以外，特此恳切道谢。书中探讨的范围，受到图书借阅的限制，以至还有缺漏。在编写过程中，深受西北大学和地理系校系两级领导的关心；一年半前还指定李健超同志以部分时间多方襄助。西大图书馆、印刷厂、地理系绘图室各单位的有关同志，也多次照顾。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早在一年前惠允协助出版。在此上册付印之际，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 成 组

1980.10.20

目 录

增订本说明	(i)
序 言	(iii)
第一篇 地理学著作的创立——先秦时代	(1)
第一章 中国地理资料的起源	(1)
第二章 《尚书·禹贡》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4)
第一节 《禹贡》的来历和写作年代	(4)
第二节 《禹贡》的地理基础	(6)
第三节 《禹贡》地理的虚实	(8)
第四节 《禹贡》地理的历史影响	(10)
第三章 《管子》书中地理篇章的特征	(13)
第一节 《管子》的来历和时代背景	(13)
第二节 《管子·地数》篇	(14)
第三节 《管子》的《地员》篇和《度地》篇	(15)
第四章 《五藏山经》——幻想与真实的结合	(16)
第一节 《五藏山经》的来历	(16)
第二节 《五藏山经》的布局与虚夸	(18)
第三节 《山经》地理观念的功过	(21)
第四节 《山经》中地理资料的发展	(24)
第五节 《山海经》其它部分的简略评价	(25)
第五章 其它古书的地理成份	(26)
第一节 《尔雅·释地》等篇	(26)
第二节 《吕氏春秋·有始览》	(27)
第三节 《周礼》的实际来历与地理观念	(29)
第六章 第一篇小结	(31)
第二篇 地理志和地方志的发展——西汉至明代	(34)
第一章 《史记》与《汉书》的先驱作用	(34)
第一节 《二十四史》的创始与发展	(34)
第二节 《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	(37)
第三节 《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	(38)
第四节 《汉书》创立的地理志	(41)

第五节 《史记》、《汉书》专传举例·····	(44)
第二章 《后汉书》与以后的正史·····	(46)
第一节 地理志传统的长期继续·····	(46)
第二节 《新唐书》专传关于河源的发现·····	(47)
第三节 《宋史》等的河渠书——关于黄河的治理·····	(48)
第三章 地理志专著的演变·····	(50)
第一节 早期发展的过程·····	(50)
第二节 唐代的《元和郡县志》·····	(52)
第三节 宋元间的地理志·····	(54)
第四节 官编《一统志》的起源·····	(55)
第四章 《三通》的地理专篇·····	(56)
第一节 唐代杜佑的《通典》·····	(56)
第二节 北宋末期郑樵的《通志》·····	(58)
第三节 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60)
第五章 地方志的发展过程·····	(61)
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背景·····	(61)
第二节 南宋《吴郡志》的特征·····	(62)
第三节 明代府志举例·····	(63)
第四节 明代县志举例·····	(66)
第六章 第二篇小结·····	(69)
第三篇 历代地图的演变——西汉至明末·····	(71)
第一章 汉代地图的广泛应用和新出土帛图·····	(71)
第一节 地图的历史渊源·····	(71)
第二节 汉代地图的掌管和应用·····	(72)
第三节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稀有帛图·····	(73)
第二章 裴秀制图的实践与理论·····	(76)
第三章 隋唐间制图的发展·····	(78)
第一节 从概况图到边防图·····	(78)
第二节 贾耽的特殊贡献·····	(80)
第四章 宋代制图的多样化·····	(80)
第一节 制图发展的动力·····	(80)
第二节 边境地图的重视·····	(82)
第三节 木刻图与地图刻石·····	(83)
第五章 元明间地图的进步·····	(86)
第一节 朱思本自编《舆地图》·····	(86)

第二节 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	(87)
第三节 陈组绉《皇明职方地图》·····	(87)
第六章 第三篇小结·····	(88)
第四篇 举世闻名的游记——战国至明末·····	(90)
第一章 《穆天子传》——神话性的旅游记·····	(90)
第一节 晋代出土的战国作品·····	(90)
第二节 《穆天子传》中的山川与《五藏山经》·····	(92)
第二章 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天竺取经的旅程·····	(93)
第一节 世界最古老的真实旅游记·····	(93)
第二节 法显精辟的地理观念·····	(95)
第三节 北魏僧惠生等的取经记程·····	(99)
第三章 记述玄奘在唐初环游印度的两大名著·····	(100)
第一节 《大唐西域记》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00)
第二节 玄奘游印的路线和过程·····	(102)
第三节 玄奘的地理观念与实地观察·····	(107)
第四章 蒙古族初兴时的《长春真人西游记》·····	(109)
第一节 长春真人与《西游记》的来历·····	(109)
第二节 绕道蒙古去西域的行程·····	(110)
第三节 丘李两氏对于沿途地理景象的观感·····	(114)
第五章 郑和下西洋随行人员的旅行记和航海图·····	(115)
第一节 七次下西洋在我国航海史上的意义·····	(115)
第二节 马欢和他的《瀛涯胜览》·····	(116)
第三节 费信和他的《星槎胜览》·····	(118)
第四节 巩珍和他的《西洋番国志》·····	(119)
第五节 《武备志》保存的《郑和航海图》·····	(121)
第六章 明末杰出旅游家的《徐霞客游记》·····	(124)
第一节 在旅游中培养的地理专家·····	(124)
第二节 短篇游记的精华·····	(125)
第三节 西南万里游与科学考察·····	(129)
第七章 第四篇小结·····	(134)
第五篇 地理专著的典型——北魏至明末·····	(136)
第一章 酈道元著《水经注》——著述方法和重要贡献·····	(136)
第一节 作者身世和《水经》来历·····	(136)
第二节 流传情况和编次方式·····	(138)
第三节 《经》《注》体例与内容特征·····	(140)

第四节	河水“重源”与江、汉上源——唯心观念大发展·····	(143)
第五节	江河入海道论证方式的对比·····	(146)
第六节	大河以北入海诸水——历史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149)
第七节	南方水道的贡献与差错·····	(153)
第八节	《水经注》与历史地理·····	(155)
第九节	小结·····	(156)
第二章	南宋论释《禹贡》的三家·····	(158)
第一节	新发展的条件和作用·····	(158)
第二节	程大昌的有关著作·····	(159)
第三节	毛晃的《禹贡指南》·····	(162)
第四节	傅寅的《禹贡说断》·····	(164)
第三章	关于水利问题的几篇论文或资料·····	(166)
第一节	北宋单锷的《吴中水利书》·····	(166)
第二节	南宋《吴郡志》的《水利》篇·····	(168)
第三节	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	(169)
第四章	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172)
第一节	《岛夷志略》的来历·····	(172)
第二节	《岛夷志略》的内容·····	(174)
第三节	汪大渊航游地点的布局·····	(176)
第四节	重要记述的深入分析·····	(179)
第五节	小结·····	(183)
第五章	明代王士性《五岳游草》中的地理见解·····	(183)
第六章	徐霞客的地理论文·····	(188)
第一节	《盘江考》的由来和评介·····	(188)
第二节	《江源考》的科学见解·····	(191)
第七章	第五篇小结·····	(194)
第八章	全册总结·····	(195)

附 图

图 一	《禹贡》九州导山导水示意图·····	(7)
图 二	《五藏山经》示意图·····	(19)
图 三	《史记·河渠书》示意图·····	(36)
图 四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地形图复原图 ·····	(插页)
图 五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驻军图复原图 ·····	(插页)
图 六	禹迹图(1137年刻石) ·····	(插页)

图 七	华夷图(1137 年刻石).....	(插页)
图 八	地理图(1247 年刻石).....	(插页)
图 九	法显天竺取经路线图	(96)
图 十	玄奘印度求经路线图之一	(101)
图十一	玄奘印度求经路线图之二	(104)
图十二	玄奘印度求经路线图之三	(106)
图十三	《长春真人西游记》路线图	(111)
图十四	《郑和航海图》片断	(122)
图十五	《徐霞客游记》路线图	(127)
图十六	徐霞客《滇游日记》路线图	(132)

第一篇 地理学著作的创立——先秦时代

第一章 中国地理资料的起源

远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形成以前,地理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早已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的祖先对于所寄居的环境,通过生活上的许多需要和实践,自然而然地会积累形形色式的地理知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随着社会活动的扩大,地理知识也就随之而多方联系,由简而繁。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商品的流通、文化的交流,和战争的冲突,也都会促进地理知识的交流和发展。

从迁徙无定的采集和游牧生活,改变成为定居的农耕生活,可能是一个个居民点定名的一个关键。居民点的定名也会引起许多山川的定名。但是长距离的大河往往要经过分段具有不同名称的长时期,然后逐渐统一。在我国最早的历史上,黄河只是简称为“河”,长江简称为“江”,最初都当做专名;后来才给它们另外加上专名。而江河两字却成为许多水道的通称。其它许多河流起初只用淮、渭等专名,并不加上水或河等字。在文字记载发生以前,各种地名可能早已采用,但是象黄河中游一带所发现的所谓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大约四、五千年,还难以了解遗留的文物中的原用地名,究竟如何分布。

为着正确认识出古代资料的来历,我们必须先了解那些资料发展的过程。从我国最古老的甲骨文起始,就带有不少地理性的零星资料。甲骨文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字体比较后代通用的文字差别很大,大致都是从商代(公元前 1766—1123 年)的文化遗址中发现,在盘庚迁殷(公元前 1401 年)以后的部分又称殷代。配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变,社会文化当时正在进入奴隶社会。刻着甲骨文的残片有许多已经影印成拓本,内中可以见到许多与地理有关的地名、山名、水名以及民族名。但是由于多数名称早已失传,很难判断它们的部位。

起源于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在周代(公元前 1122—256 年)达到全盛时期,少数重要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以及石碑上应用的最古老的字体,合称为金石文。金石文限于一些特殊的用途。文字记述的扩大应用,以及从简略的条文扩大成文章以至书籍,都是随着在竹简或木简上书写,逐步串连成长篇著作。文字的结构也在不同地区经过许多变化,直到秦始皇时才采用统一的字体,创立“书同文”的体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民间地理知识的发展,在最古老的文字资料中,只留下些自然景物的名称,和位置难以查考的地名。

由于竹简和木简都不能保存得太久,所以最古老的书本早已失传。系统文字记载起源的时间,也就难以查考。历代出土的竹简,从晋代咸宁五年(279)或太康二年(281)的汲冢到现代,全部都是战国时代开始的作品,汲冢的《竹书纪年》原本,实际上是魏国的纪年史,只是追溯

到夏代。但是孔子流传下来的《五经》以及其它若干古文献,足以反映春秋时代(公元前 722—481 年)早已存在着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能追溯到西周初年(公元前 1122 年)左右。一些被称为起源于早到神农、黄帝时代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后代来历不明的作家所伪托。

在后代继续保存的古代文献中,孔子(名丘,公元前 551—479 年)所整理或编写的《五经》年代最早。《五经》在孔子编订的时期,只是简单称为《易》、《诗》、《书》、《礼》和《春秋》,要到西汉时独尊儒家,才一一加上“经”的称号,推崇为经典文献。《五经》之中,《春秋》这部春秋时代的列国纪年史,和《书》这部除个别篇章属于春秋时期,是春秋以前追溯到唐尧的片断史料,都包含不少地理资料。《诗》收集《风》、《雅》、《颂》三大类的各国列代诗歌,也包含相当浓厚的地方色彩,兼有地理资料的价值。《易》简述阴阳生克之理,偶尔涉及各种自然界的作用。《礼》在《五经》的原本中,正如班固《汉书》中的《艺文志》这部最古老的图书目录的记载,原来的“礼古经”是《仪礼》。这一部书叙述各种仪式和服装,完全与地理无关。《礼记》一书,只是孔子的少数弟子记述他的教材。至于王莽时期(公元后 6—22 年)列入儒家经典的《周礼》一书,实际上是西汉末年所编成的伪托古书,将在本篇末一章论述。

《诗》通常称为《诗经》,收集诗歌三百零五篇,几乎有半数的篇章提到许多大小河流,较少的著名山岳,以及镐京、岐下、牧野等若干地名,一般都是周代所通用,有许多还沿用到后代。例如称颂周王朝的故土,在《大雅·皇矣》一首中,“居岐之阳,在渭之将”,区位非常明确。《文王有声》一首中,“丰水东注”和“镐京辟雍”两句,又显示出周代初期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名称,就起源于《诗经·荡》的一首“文王咨,咨汝殷商,汝无休(音庖休,即自豪)于中国……”,又《民劳》一首“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当时这一名称的应用,似乎局限于商王朝或周王朝直辖的境域,同时也类乎后代的中原,所以与四方相对称。

《春秋》一书的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孔子原著在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绝笔,末尾连续记到“孔子卒”的十六年(公元前 479 年),是后人所附加。历史上所谓春秋时代的 241(或 243)年就是因这部书而得名。另外有《公羊传》、《谷梁传》,申论孔子所记史事叙述方式的用意。还有《左传》一书,大致与《春秋》平行,偏重在详细叙述重要的史事。《春秋》一书实际上本是一部简略的编年史,只是因它具有纲领性作用而特别受到儒家的推崇。这部书连同上述所谓《三传》,也包含许多地理资料。它们比较希腊的希罗多德(公元前 484—425 年)的历史名著成书的年期,还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春秋》等书的内容,本是偏重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儒家对于孔子所定下的一些褒贬,尤其重视。但是,从地理方面的作用来看,历年所记载的所谓灾异,包括日食、水旱、大风雪、地震、螟、螽(蝗)等情况,以及相反的丰收“大有年”,在时代性和系统性两方面,都是国际间无比宝贵的资料,最远追溯到距今 2700 年之前。所记的年月四时,以及用干支标明的日期,对于古代历法的演变,也大有参考价值。

孔子所修的《书》,又称《尚书》或《书经》。《春秋》相当于孔子时代的近代史,而《尚书》是当时的一部通史,上起唐尧(约在公元前 22 世纪),下至秦穆公的《秦誓》(公元前 624 年)。但是在上下十六个世纪中,全书的资料只是分散在少数几个时期,同一时期的资料,少者只有一、

二篇,多者可以有四、五篇。在秦始皇焚书以后,西汉时重新流通的《尚书》,成为用隶书的所谓今文本和用篆文的所谓古文本。两种文本的分篇和篇数多少,都大不相同,以至两派之间存在过许多争论。

对照上文所讲过的我国文字记载发展过程,《尚书》怎能在殷商时代已有专篇,怎能在传说历史的唐、虞、夏的三代,已经形成那样有条有理的史料?孔门弟子记述的《论语》,极力颂扬他的著述活动具有“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的特征。《尚书》记述尧、舜、禹、汤、文、武的功业,儒家的传统观念,因而认定全部篇章都是从有关时代流传下来。但是,从记载文字的发展过程来对照,孔子修《书》所收集到的古文献原文,恐怕只限于西周初年;而更早的记述是他根据各种古代传说所编写。为了解剖麻雀,首先可以从作为最古老的《尧典》中所讲的历法和观测方法入手。

《尧典》用“帝曰、咨汝羲与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简单的这样一句话,被用来代表所谓“敬授人时”。同一篇的上文明说“羲与和”是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四个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以三百六十六日定为当时所称的“期年”,就是阳历年。“定四时”是指四季。古代相沿本来通用阴历,所以这两种历法配合时,每二、三年中必须置一“闰月”。按照《尧典》的说法,帝尧交代给他派定要分到四方远地测定四季的四个人,按一年三百六十六日来“授时”。阳历果然在唐尧那样早的年代已经测定吗?实际上这是春秋后期,在劳动人民长久观测星象周期的基础上才能取得的成果。

《春秋》的一些记载“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闰月不告月,朝于庙”。古礼每月朔日要祭于庙,称为告朔,所以有这一条表明闰月不行此礼,“犹朝于庙”不合常礼。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春秋》只记“晋杀其大夫”(记三人姓名),同年《左传》不但叙述更详细,而且开头写明“闰月乙卯”的日期。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春秋》记“闰月葬齐景公”。《左传》但记景公死前争继承权,而不记月份。这一百多年中,记下闰月的资料寥寥无几,因为有特殊的事发生在闰月才记。春秋时代后期所发展的历法,包括置闰月和以三百六十六日为“期年”,竟然列入《尧典》,显然是孔子在以今论古。《尚书》中西周以前的各篇,可能都是孔子自己编写的古代史料。

《尧典》关于定四时,列举分派羲仲等四人,以下述方式执行任务:

- (1) “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以殷仲春。”
- (2) “宅南交,……以正仲夏。”
- (3) “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以殷仲秋。”
- (4) “宅朔方,曰幽都,……以正仲冬。”

这四项中所指的地点,只不过含混假定,杜撰名称。列代注家企图指出真实地点,都不能令人满意。不说别的,地面上怎样能找到迎日出和送落日的地点,又怎能在南北二端定冬夏?这一整套设想,无非是主观的幻想。

其实民间传说的历史性故事,如同宋代梁山泊的各种传说,多少都还带有真实成分。尧、舜、禹、汤的历史地位,尽管受到儒、墨各家以各自的唯心观点渲染宣传,可能具有一些历史根据。尧、舜、禹时期连年发生洪水,而先后由鲧、禹主持治水,前者失败而后者成功,可能是人类

历史上长期与洪水灾害斗争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但是水情严重到“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又是《尧典》过分夸大；而治理的程序，据《禹贡》的描述，遍及大小水道，显然远远言过其实。

《尚书》里面的地理资料，在周代各篇中联系许多叙述到的活动，比较翔实可靠。这些资料大致可以和《诗经》互相印证，但是远不及后者的详细。《尚书》各篇中，惟独《禹贡》的地理资料，比较详细而又带有系统观念。孔子把它列入虞夏书的部分，早先的传统见解，都信以为禹的作品。但是《禹贡》的内容也还牵涉许多问题，留到下一章再深入分析。

总之，从儒家《五经》中的《诗》《书》和《春秋》这三部书中散见到的许多地理资料，足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随着生产和政治的发展，春秋时代的晚期在文化上已经达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79—247年）百家争鸣的序幕。《易（经）》的《繫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大约是“地理”这一名词在我国最早的应用。《易（经）》中附于正文之后的《繫辞》等篇，可能也都出于孔子，但是，这一引文中所谓“天文”、“地理”，都还偏重于抽象的定义。

第二章 《尚书·禹贡》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禹贡》的来历和写作年代

《尚书》中的《禹贡》，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公认为一篇具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甚至长时期采用它的九州作为一种超时代的地理区划。自从战国两汉以来，早先都公认过它为禹本人或禹时代在他治水成功（约在公元前21世纪）后的一份记录。从上文所说明的文字记载发展的过程来看，当时还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篇内容复杂而条理井然的作品。

关于《禹贡》写作的年代，四十多年前顾颉刚先生曾经倡导讨论，并且出版《禹贡》杂志，他在1959年发表的《禹贡（全文注释）》一文中，仍然主张“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①。他认为“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国所达到的疆域”，并且受其它许多条件的限制。其时正是孔子死后二百年，《尚书》早已风行一时。竹简的书本传抄困难，抄本未必太多，但是传诵而且能口授的儒生早已不少。《禹贡》倘若到这时才出世，试问怎能获得公认为《尚书》所固有而不加指摘？这一个论断纯乎是脱离《尚书》流传情况的形而上学观点。

辛树帜的《禹贡新解》^②提出“禹贡成书年代，应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当时的太史所录”。这个时代起于公元前1185年，终于公元前952年，超过两个世纪。作者假定《禹贡》是太史官所录，却并未说明《禹贡》这样一篇文字的写作，为什么要经历这样长久的年代。在这全文的首尾，为什么要讲到相距一千多年的禹，并且称之为《禹贡》？九州之中雍州的得名，是以表明《禹贡》写作于秦国在公元前677年徙都雍之后，上距穆

①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② 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

王在三个世纪以上。赋制的通行更要晚,铁更没有在西周早期受到过重视。

《禹贡》的流传于《尚书》里面,在历史上从没有人怀疑过。战国时代,尽管孔孟的法先王政治思想,受到过法家的法后王政治思想的挑战,儒家的经典著作仍然在风行一时。假定《禹贡》是在战国后期写成的,突然加进《尚书》里面去,怎能完全不受到任何怀疑?到了西汉时代,《禹贡》也还是今文本和古文本共有的篇幅,更足以证明它是孔子修《书》时所固有。

孔子编写《禹贡》,并不是完全孤立地称颂“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不论这几句所谓书序,究竟是否他原来的标题。参照《尚书》今文本《尧典》的后半,或古文本的《舜典》,命禹治水是舜在位时的安排,在这一篇中先提到“肇十有二州”,没有指明名称和部位。治水“告厥成功”,却成为“九州攸同”,应当也在舜逊位之前,《禹贡》应当和《尧典》等篇同样作为《虞书》部分的一篇。实际上对于分州问题的叙述,显然前后矛盾。这些篇的编写,主要就是作为先王之道的史料。

《禹贡》的全文只有短短一千二百字,但是逐段的内容比较充实而具有系统性。主要的特点是穿插说明治水有关的山川分布的部位,和九州贡赋有关的生产发展情况,同时还设想到输送贡品的贡道,和由近及远发展情况的差别。把这些成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假想的舜禹时代的行政规划,而传统观念竟然把它认作当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孔子也就借以体现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这些意图更可以作为《禹贡》出于孔子之手的论证。但是判断《禹贡》写作的年代,必须首先识破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言必有据”。

主张《禹贡》形成于战国后期的论证,都带有片面性。例如九州的跨到梁州,限定以公元前316年秦取蜀为依据。关于赋制限定以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废井田为依据。梁州产铁以卓氏迁蜀为依据,恐怕是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以后。以最后一点来看,把秦始皇统一(公元前221年)之前六十年假定为《禹贡》形成的年期,恐怕还失之过早。实质上的问题是不必把镗(音留)铁银镂之类列入贡品过分当真。

况且《春秋》记述梁州地境的开拓,不限于秦的一方,而另有楚的一方。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秋,楚人灭麇,由东侧进入“梁州”境。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秦楚与梁州境内的巴人联合行动,足见秦人在未向蜀中开拓疆土之前,早已与巴蜀有往来。再看赋制的起源,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早已“初税亩”,到孔子在世时,可能早已更加推广。“税亩”就是赋制。《论语》:“由(指门生子路)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足见孔子生前已相当风行。至于冶铁的发展,卓氏入蜀后能致富,先前在他们的本土赵国等地,早已有相当基础。考古的发现也正在把铁器的发展逐步往前提早到春秋后期。

至于战国秦汉的作品中出现的舜死于苍梧,禹会诸侯于会稽等地,都不见于《禹贡》,足见后代人对于古史的传说,按照新开拓的地区任意附会古代人的活动,愈演愈烈。而《禹贡》对于楚国南部和吴越境地的山川,仍然比较模糊,正足以证明它写作的年代较早。孔子虽则有过一段周游列国的经验,只是局限于中原。《禹贡》对于南方山川的叙述,基本上局限于大江的附近,也反映出它的作者和形成年代的特点。

《禹贡》的编写,基本上是孔子依据春秋时代他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所写成的古